

#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最佳时间的判定与实证分析

## ——基于人口城市化收益最大的视角

包月英<sup>1,2</sup>, 高飞<sup>3</sup>

(1. 河北工程大学 科信学院, 河北 邯郸 056038; 2. 华中科技大学 社会学系, 湖北 武汉 430074; 3. 东北财经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25)

**[摘要]**人口城市化的核心是市民化, 市民化的主体是农民工。在我国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 如何获得人口城市化的最大收益,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基于此, 将人口城市化分为两个阶段, 通过构建数理模型, 求出市民化最佳开始时间的判断标准, 并在此标准下进行理论分析。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 我国市民化开始时间推迟, 导致市民化收益较低。

**[关键词]**城市化; 市民化; 时间判定; 政策建议

doi: 10.3969/j.issn.1673-9477.2013.04.005

**[中图分类号]** F299.2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3)04-021-04

本文定义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为城市化, 取得城市户籍称为市民化, 整个进程称为人口城市化。城市化是各国发展进程中的必经阶段,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国近年来一直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 按照常住人口计算, 截至2012年, 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了52.57%, 但若按户籍人口计算, 这个数字只有35.29%, 两者之间有着17%的差额。这意味着大量农村人口迁向城市, 并常住城市就业、生活, 但他们无法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以及政治权益等方面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 甚至在工作上也同工不同酬。也就是说, 相当一部分农民成功实现了职业的转变, 成为城市里的农民工(非农化), 却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变, 成为与城市户籍居民一样的身份的城市居民(市民化)。这是因为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 城乡劳动力要素流动的壁垒被打破, 非农化进程得以快速进行, 然而, 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 限制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 使我国并未出现像西方国家那样经历从农民向市民的职业、地域和身份相同步的彻底转变, 而是形成了由农民到农民工、再由农民工到市民的路径, 这条路径是由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特殊国情决定的。

根据这条路径的阶段特征, 是否进城(非农化)由农民自己决定, 农民将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出发, 全面比较、衡量自己的进城收益和进城成本, 这也意味着城市化发展是一个市场化的自发过程, 政府无法决定农民的主观意愿。但是, 农民工是否转变为市民则由政府决定, 即政府行为决定市民化。研究表明, 农民工市民化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农民工市民化1000万人口(700万农民工加上其抚养人口)可使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约1个百分点。

据测算, 每年转变1000万农民工可增加240亿元消费。而且, 农民工市民化将促进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 可以提高服务业比重, 优化经济结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10)。但是, 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大量的公共支出, 就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成本而言, 按照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 每个农民工市民化的政府公共支出成本约在8万元左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11)。按每年实现1000-1500万农民市民化的速度来看, 每年约需要投入1万亿元左右, 这对地方财政来讲将形成巨大压力。因此, 作为理性的地方政府, 必然对市民化权衡利弊, 从收益最大的角度来决定是否进行市民化。

但是, 从经济发展规律及目前中央政府推进市民化的决心来看, 市民化已经成为当前地方政府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2011年中央工作会议明确、集中地提出要解决农民工问题。会议提出, 要重视农民工在城镇的工作生活问题, 帮助他们逐步解决在就业、居住、医疗、子女入学等方面遇到的困难, 有序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城落户。对于农民工住房困难, 也要逐步解决。“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 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大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放宽外来人口落户条件。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和生活问题, 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由此可见, 推进市民化已经成为当前地方政府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但是,

**[投稿日期]** 2013-09-15

**[基金项目]** 2012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 HB12GL013)

**[作者简介]** 包月英(1979-), 女, 四川达州人, 副教授, 在读博士, 研究方向: 社会学、市民化。

由于涉及较大规模的公共支出，地方政府对何时推进市民化，从而使收益成本比最大，缺乏准确与合理的把握。我们认为，这与缺乏推进市民化最大价值标准有关。

鉴于此，本文根据人口城市化的发展路径与阶段特点，构建人口城市化进程中实现价值最大的数理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 一、人口城市化收益模型的构建

### (一) 人口城市化的收益与成本

1. 人口城市化的收益。首先，人口城市化不仅可以拉动消费，而且还可以增加国家固定资本的投资和公共消费的支出，从而改善政府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次，人口城市化可以带动现代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不仅能缓解农村资源承载压力、而且对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形成适度规模经营及加快农业现代化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和契机。其次，人口城市化会引致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和城镇集中。人口城市化可以为我国工业的升级换代提供人力资源基础，从而有利于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形成。

2. 人口城市化的成本。人口城市化进程中成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地方政府必须为城市化过程中因大量人口聚集必需的完善的生活设施而投资。另一部分是市民化进程中，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农民工在为城市建设、国民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虽然身在城市，却无法与城市居民一样平等享受城市的各种权利和社会福利。因此，人口城市化时，政府除了需要提供基本公共设施外，也需要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即政府必须对市民化进程中的成本进行支付，通过有效加大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同时尽可能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个人成本，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物质基础。

### (二) 人口城市化的模型构建

假设一、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我国人口城市化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农民—农民工（非农化），农民工—市民（市民化）。两个阶段时间上连续。

假设二、两个阶段都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正向影响，我们分别称之为城市化收益与市民化收益，收益大小分别为（ $G_1$ ， $G_2$ ）

假设三、市民化进程需要成本，包括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公共管理等投入。我们设其总成本固定不变为  $D$ 。

该过程中所有的收益与成本都折算成现值加以比较，于是，可以构建人口城市化价值最大化模型。

$$G = \int_0^T G_1 e^{-t} dt + \int_T^\infty G_2(g, t) e^{-t} dt - D e^{-T} \quad (1)$$

$G_1$  代表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收益大小； $G_2(g, t)$  代表市民化进程中产生的收益大小； $D$  代表非农化与市民化进程中的总成本； $i$  代表利息率； $g$  为外生变量，代表户籍制度所附带的单位公共服务； $t$  代表时间。 $T$  是决策变量，即开始市民化的时间。也就是说，在时间  $T$ ，农民工开始变为城市户籍居民。右边第一项代表非农化价值，第二项代表市民化价值，第三项代表非农化与市民化过程中的总成本。 $G$  表示在整个人口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价值。

通过对方程求极值得：

$$G_2(T, g) = G_1 + D \quad (2)$$

上式的含义可以表述为：市民化收益等于非农化收益加上市民化成本时，市民化收益最大。

### (三) 模型分析

我们进一步对（2）式求导，即目标函数（1）式的二阶导数，通过对其进行二阶导数正负的判断，进而判断（2）式的函数性质，进而得出目标函数（1）的二阶导数：

$$\frac{dr(T, x)}{dT} < 0 \quad (3)$$

同时，（3）式表明（2）式存在极大值，且极大值为1，即非农化收益  $G_1$  与市民化收益  $G_2$  以相同比例增加或减少时，并且  $G_1/G_2 = 1$ ，此时人口城市化进程收益达到最大值。同时，（4）式表明（3）式存在极大值，且极大值为1，即非农化收益  $G_1$  与市民化收益  $G_2$  以相同比例增加或减少时，或者说  $G_1/G_2 = 1$  时人口城市化收益达到最大。但是，也有可能二者比值不等于1的情况，即两者并不是以相同比例增加或减少。对此，我们进行情况讨论：

假设： $l = G_1/G_2$ ，结合（2）、（3）式，我们判断：当  $l > 1$  时，（3）式为减函数，即：非农化的时间越长，市民化收益越低；当  $l < 1$  时，（3）式为增函数，即：非农化的时间越短，市民化收益越高。 $l = 1$  时，人口城市化收益最大。由于  $T$  是决策变量，则此时市民化最佳时间  $T$  的隐函数为：

$$T(g) = T(G_1(T, g), G_2, D) \quad (4)$$

该函数有如下性质：

性质一： $\frac{\partial T(g)}{\partial G_1} < 0$ ，意味着市民化收益越高，

则将提前市民化开始的时间。

性质二： $\frac{\partial T(g)}{\partial G_2} > 0$ ，意味着非农化收益越高，

则推迟市民化开始的时间。

## 二、计量实证分析

### (一) 指标解释与数据来源。

1. 指标解释。在建立模型之前，我们首先对实证研究将涉及到的相关变量进行简要的介绍。(在解释变量方面，一是城镇化水平。本文运用以城镇化率(UBN)=非农业人口/总人口作为衡量城镇化质量的指标。二是市民化水平。市民化率作为市民化水平的代理变量，主要表现为非农业户籍率。计算公式通常为非农业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由于城市常住人口中农民工部分存在较大的流动性，存在着统计上的困难，因此我们用城镇人口替代城市常住人口。因此，本文中市民化率(CTZ)=城市户籍人口/城市常住人口。

其他控制变量主要有：①产业结构(THI)。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表示产业结构的变动，由于城市化推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提高了劳动力的收入水平，我们预计该变量的系数为负。②城乡收入比(URG)。我们优先选用城乡居民收入比(URG)作为城乡差距的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这是研究城乡收入差距最常用、最直接，也是最容易计算与理解的一个统计指标。

2. 数据来源。本文研究采用的时间跨度为2000-2011年，由于港澳台地区的制度与大陆地区存在很大差异，我们没有采用港澳台数据作为样本，另外，由于西藏存在特殊性，导致某些指标上的数据统计不全，为了保持变量的完整性以及避免缺失数据对我们的后续研究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我们

在样本中剔除西藏。因此，本文选取全国除西藏外的30个省市作为研究样本变量。所有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2年)。为了消除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在下面的实证分析过程中我们对各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 (二) 计量模型构建与估计

1. 计量模型的建立。本文重点考察城市化与市民化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构建如下的计量模型：

$$Y_{i,t} = c + \alpha X_{i,t} + \mu_{i,t} + \xi_{i,t} \quad (5)$$

其中， $Y_{i,t}$ 表示第*i*个省份在*t*年的经济增长水平， $X_{i,t}$ 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构成的向量， $\alpha$ 为待定系数， $c$ 为个体之间相同的截距， $\mu_{i,t}$ 为个体效应， $\xi_{i,t}$ 为随机误差项。

为了防止面板数据中存在单位根，而出现“虚假回归”问题，因此，在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之前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各变量的平稳性，并进一步判别它们之间的协整性，然后在此基础上采用系统矩估计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2. 计量模型的估计。(1) 面板单位根检验。为了避免单一检验方法的缺陷，提高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针对变量数据生成的特点采用LLC检验法、ADF-Fisher CH检验法以及Hadri检验法三种方法对主要变量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三种检验方法的原假设均为：原序列存在单位根。经检验，除了少数控制变量的单位根不能拒绝原假设外，其它变量在三种检验法下都非常显著地拒绝了存在单位根为零的原假设。因此，我们有比较充分的理由断定各变量不存在单位根。(2) 检验结果与分析。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市民化与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内在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表1 城市化与市民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计量分析结果

| 解释变量 | Coef.         | Std. Err. | P> z  | [95% Conf. Interval] |           |
|------|---------------|-----------|-------|----------------------|-----------|
| UBN  | 0.0925005***  | 0.0181973 | 0.000 | -0.018573            | 0.0297998 |
| CTZ  | 0.0056134     | 0.0122944 | 0.648 | .0567015             | 0.1282995 |
| URG  | 0.0364671***  | 0.0061032 | 0.000 | .0244605             | 0.0484737 |
| THI  | -0.0015338*** | 0.0003879 | 0.000 | -.0023775            | -.0008513 |

注：样本数：360。估计方法：固定面板效应。\*\*\*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方括号内为统计量相应的概率值。

## 三、实证结果分析

我们以估计结果为基础，对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进行分析。城市化影响经济增长的系数为0.09，说明城市化率的提高显著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这与我们预期一致。这说明，我国不断推进城市化的政策措施是正确的，通过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让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不仅提

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而且增加了因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的报酬。市民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为0.005，从统计意义上说，这个结果不显著，但这不妨碍我们进行理论模型分析。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的情况与上文的数理模型分析一致，即当前我国以扩大户籍为核心的市民化措施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对当前的市民

化措施进行反思并调整。

根据理论分析和计量实证结果,我们求得: $l = G_1 / G_2 = 0.09 / 0.005 = 18 > 1$ ,这说明非农化阶段的时间过长,导致市民化收益过低,与我国实际情况高度相符。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城市化率的增速可能略有减缓,但总体上仍处于快速发展的通道区间。据有关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65%左右,这意味着有3亿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工作生活。快速推进的非农化进程,使得农民以低成本进入城市,通过城市的集聚效应,获得了大量就业机会。而且,进入城市的农民本身也通过加深分工,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同时,满足人们进城需要的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更具有广阔的增长空间,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最强大、最持久的内生动力。从收益成本比来看,收益远大于成本。因此,政府鼓励农民进入城市,但却大大推迟了市民化开始的时间。

与快速增长的非农化相比,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速度相对较低,这意味着大量农村人口迁向城市,但他们无法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以及政治权益等方面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甚至在工作上也同工不同酬。都对我国市民化时间起着推迟作用。然而,如果市民化时间长期推迟,那么大量农民工就会因为户籍制度不能成为市民而享受市民待遇、融入城市,这将不仅使他们无法在城市落户和拥有稳定生活预期而脱离农村,阻碍了农村资源的释放及集约经营,而且,长期下去将导致对城市经济集聚效应的巨大浪费,从而损害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农民工市民化的本质是赋予农民工真正的市民权利。而在现有体制环境下,必须加快农民工市民

化,并让他们享受到与城市户籍居民身份相一致的公共服务待遇,实现社会身份的真正转换。这将增加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成本,降低非农化进程中的收益,从而提前市民化推迟的开始时间。也就是说,我国应该更加关注非农化与市民化的持续统一,从而实现非农化进程人口数量增长与市民化进程人口质量提高的长期均衡发展。

#### 参考文献:

- [1] 刘晓峰, 陈钊, 陆铭. 社会融合与经济增长: 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内生政策变迁[J]. 世界经济, 2010(6): 60-80.
- [2] 周黎安.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J]. 经济研究, 2004(6): 33-40.
- [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总体态势与战略取向[J]. 改革, 2011(5): 5-29.
- [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10(6): 4-16.
- [5] 黄崧.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J]. 南京社会科学, 2009(2): 97-104.
- [6] 付文心, 赫宝祺.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1(10): 64-67.
- [7] 徐建玲.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度量: 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08(9): 66-70.
- [8] 刘传江, 徐建玲.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M]. 人民出版社, 2008: 244-267.
- [9] 周小刚, 陈东有. 中国人口城市化的理论阐释与政策选择[J]. 江西社会科学, 2009(12): 142-148.
- [10] 高铁梅. 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40-42, 267-269, 281-288.

[责任编辑 陶爱新]

## Judgement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optimum citizenization time of the rural migrant workers

BAO Yue-ying<sup>1,2</sup>, GAO Fei<sup>3</sup>

(1. College of Kexin,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2.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3.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Dalian 116025, China)

**Abstract:** the core of urbanization is citizenization, with the main body of migr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It is worthwhile to study how to get the maximal gaining in the fast urbanization of China. This paper divides the issue in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through constructing mathematical models, tries to find the standard determining the optimal urbanization time, and makes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under the standard. The second part makes an empirical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condition in China: the urbanization begins late in China, which leads to a low gaining. Thus the paper proposes a differentiation policy of citizenization,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financial expenditure, and improving the official examination system.

**Key words:** urbanization; citizenization; time judgement; policy proposal